

我们都是贵州人

贵州移民心态剖析

蓝东兴 著

《贵州：让历史
告诉未来》

丛书



神奇的喀斯特王国
绿色的诱惑
无形的链结
“黔军”出山

□ 我们都是贵州人
“虫”与“龙”的辨析
贵州民族出版社

《贵州：让历史告诉未来》丛书

贵州省史学会

世纪中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编

我们都是贵州人

贵州移民心态剖析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们都是贵州人：贵州移民心态剖析 / 蓝东兴著.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12
(贵州：让历史告诉未来丛书)
ISBN7-5412-0932-5

I. 我... II. 蓝... III. 移民-心理-研究-贵州省
IV. D63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5761 号

我们都是贵州人

——贵州移民心态剖析

责任编辑：周国茂

封面设计：吕凤梧

技术设计：潘 松

出版发行：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邮编：550001)

电 话：(0851)6829260(总编室) 6826871(发行部)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90mm×1240mm

字 数：108 千字

印 张：4.5

印 数：1~2000 册

版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2.8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由厂家负责调换。

《贵州：让历史告诉未来》丛书，是贵州省史学会和中天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1999年春节前就已决定共同联手启动的一项跨世纪的工程。而它的酝酿则早在1997年12月，起初拟议中的书名为《贵州历史研究》丛书。自与中天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联手以后，学者们受到企业家经营管理经验和竞争意识的启发，经过有关专家、学者和一些实际工作部门的领导者反复切磋、构思，才有现在的名称。我们的初衷是为贵州制定“十五”规划和迎接新世纪、提供学者群研究贵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某种思路和一得之见。在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体现丛书组织者与作者对贵州问题的真知灼见。

丛书选择制约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甚大的若干方面或领域，形成一系列研究选题，每个选题独立成书。通过用点、线、面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走进贵州历史的真实。以发散思维、逆向思维和超前思维的理性沉思，对富民兴黔提供某种启示或某些思路，使历史科学的隐形价值变为现实的经济、社会价值。这是我们的热望和努

力追求的目的。

1999年5月21日，贵州省史学会、中天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贵州：让历史告诉未来》丛书新闻发布会暨签约仪式，向社会公布丛书编写的目的、意义和第一批选题，以类似招标的方式向社会征求新的选题和选题承担者。丛书的立意和运作方式，冲破传统的历史研究的规范，深深地楔入现实，撞击着关心贵州现状和未来的人们的心灵，引起了贵州学术界一种较普遍的理性震撼。在关注它的人们心中掀起了背靠历史，直面现实，期许未来的新风。

这新风，新在立意。丛书打破学科、部门和系统的界限，以历史作为切入点，以中国的未来作为参照系，尽可能集中省内外专家、学者和志士仁人的心智，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多层面，对贵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观照。让更多的人从历史中汲取走向未来的思想营养和精神力量。它不仅向人们展示历史的真相和丰富内涵，而且展示历史能告诉未来什么，以及它怎样

去告诉未来。经过丛书的诠释,“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句名言便生气勃勃地与贵州各族人民在 21 世纪的伟大事业声息相通,休戚与共。不仅给贵州的史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给整个贵州的社会科学研究和省情知识的普及拓展了广阔的空间。过去、现在、未来的诸多方面,都变得浅近而真切。

这新风,新在运作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文化与企业联姻司空见惯,但大抵是一方系“贫僧化缘”,解决科研经费短缺;另一方是“出血”以回报社会或自树形象。而贵州省史学会与中天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是基于双方对贵州的忧患意识、危机感和加快贵州发展的使命感、紧迫感。合作中,前者除了获得经费资助外,更是借中天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船下海,走向市场,获得前瞻性的思考以观照现实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在学术研究中广泛引入竞争机制,以历史科学来整合各社会学科的群体优势,实现思想资源的重组,实施精品战略,探索双向或多向选择等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方法、新观念;而后者作

为贵州有卓越表现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不仅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出发，为丛书的编写出版无偿提供资金支持和智力支持，而且基于未来的竞争是综合实力的竞争、科技文化的竞争的认识，从策划、编辑、出版、发行全方位地介入，努力使企业的文化建设提升到新的层次。另外，丛书一反设置主编的常规，根据具体选题由编辑部聘请专家评审，并明确一位专家主审或作为特约编审，集体负责书稿的质量把关。丛书的选题承担者，采取向社会公开招标的方式产生。不少对该选题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成了这套丛书的主要撰稿人，令人欣慰。贵州民族出版社作为这套丛书的出版者，也先期介入，形成策划组织者、作者、编审者和出版者群策群力、优势互补而又责有所归的运作方式。因此，这套丛书的每一本书，尽管有署名作者，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却都是集体智慧的成果，是老、中、青三代社会科学工作者相结合的产物。

这套丛书启动之日，正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号角吹响之时。西部大开发，贵州怎么干？一时成为贵州全

省上下思考议论的热点，也成为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丛书的立意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仿佛是独得先机似的合拍。这看似偶然的巧合，实是党中央英明决策反映了时代的呼唤和民心民意。而贵州学术界和企业界的理论触角、学术良知和使命感顺乎时代潮流，合乎人民的需要使然。

历史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任何事业的成功者，都是善于汲取历史经验的智者。我们要把握未来，就必须在现实中组织历史的军团去参与向未来的进军。

这套丛书将以真实的历史为思想的基石，实话实说，唤醒贵州全省上下的危机感、使命感。使贵州在未来的发展中，除了满腔热情之外，多一些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辩证的理性思考。有历史的警钟长鸣，历史的启示常驻，才会有历史的创新！

《贵州：让历史告诉未来》丛书编委会

2000年10月

注：中天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世纪中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目 录

一、“我们是贵州人”

——历史上少数民族移民心态 (1)

(一)历史文化承载的自尊..... (1)

(二)民族政策唤起的自信 (14)

二、“我们的祖籍不是贵州”

——历史上的汉族移民心态 (24)

(一)屯堡人:高傲消散是孤独..... (24)

(二)客民:得意尽处的失落..... (37)

(三)抗战难民:掂量着生存的意义..... (49)

三、“我们是贵州人吗?”

——当今移民心态 (61)

(一)南下西进支黔干部:矢志革命,乡情难断 (61)

(二)分配入黔的知识分子:在守候中眺望..... (69)

(三)三线建设者:生命随着企业跳荡..... (77)

(四)上山下乡的“知青”:山风扬不起理想的船帆..... (86)

(五)流动人口:说不准哪天回家..... (92)

四、“我们都是贵州人”

——培育良好的移民心态 (102)

(一)移民亲近贵州..... (102)

(二)贵州拥抱移民..... (114)

一、“我们是贵州人”

——历史上少数民族移民心态

(一)历史文化承载的自尊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的大国。从分布而言,中国境内许多民族往往多居住或集中在其发祥地,如满族、鄂伦春族、赫哲族发祥于东北,至今仍主要集中在东北;蒙古族形成在大漠南北,至今仍主要分布在大漠南北;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等诞生在西北,至今仍主要活跃在西北;藏族、门巴族等成长在青藏高原,至今仍主要生活在青藏高原。贵州的情况则很不相同,占全省人口近70%的汉族来自中原,世居在这里已有几千年的氏羌族系的彝族和土家族来自云南和四川等地,百越族系的布依族、侗族、水族、毛南族、壮族祖先的故土在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苗瑶族系的苗族和瑶族自己认为先辈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贵州的布依族和水族占国内本民族的95%以上,苗族和侗族也不低于国内本民族的50%。可见,贵州是这些民族分布最集中,人数最多的地区,奇怪的是他们中大多不承认贵州是自己的发祥地,洋洋数百数千言的古歌、代代相承的传说故事不断重复着这类无从考证

的说法。但是,如果询问这些少数民族的人们是不是贵州人,他们会觉得这样的问题十分可笑因而拒作回答,在他们看来,自己与众不同的服饰和语言、独具特色的民情风俗以及数千年的开发建设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是理所当然的贵州人。

苗族族系古称“三苗”、“九黎”,传说很早的时候生活在黄淮平原。直到今天,贵州的苗族坚持认为自己是蚩尤的后代。就连目不识丁的苗族老汉都能讲述蚩尤率领部族与炎黄集团浴血奋战死于涿鹿的故事。蚩尤战死以后,“三苗”退据南方,分布“在彭蠡之波,在洞庭之水”。又被尧帝攻击,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迁徙生活。有的被驱赶到“三危”(今甘肃祁连山),有的被投放到“崇山”(今湖南大庸)。“三危”的苗人因不适应冰天雪地的严寒气候而折返南下,翻山越岭,辗转来到贵州的深山密林。这一段艰难的往事被编成传说流播至今,子孙通过传说遥想祖先在祁连山的雪地里求生、在涅江(浑水河)苦难度日的岁月。黔东南《苗族古歌》中保留着这段内容:“日月向西,山河向东行,我们的祖先啊,顺着日落方向去”;“经历万般苦,迁徙来西方,寻找好生活。”“崇山”的苗人也因为楚人侵逼而向西部山林退避。受汉朝统治者追逐而深入到武陵山脉腹地。

武陵山脉蜿蜒连绵,山高水深,沟壑纵横,处于巴国南鄙、楚国西陲,虽然从秦惠王时就划入黔中郡,但是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也没有正规治理。西汉时纳入武陵郡,也只是形式而已,这是个中央王朝想统治而无力统治的地方。苗人经无数次地迁徙流浪之后,终于在武陵山中得到了片刻安宁,他们和来自四川的廪君蛮以及世居的濮人互不相犯,关系和睦。他们“好入山壑,不乐平旷”,主要生活在山野,濮人则大多聚居在沟谷溪畔。然而,随着中央政权层层推进,平静未能维持多久。苗人不仅在人数上无法与中央王朝抗衡,而且经济落后、社会组织松散、政治策略和斗争艺术也不能相提并论,在几番殊死搏斗之后,只得带着血泪再度西迁。在



迁徙的过程中分化出“莫徭”，后来形成瑶族，其他的则形成苗族。

苗、瑶的历史，实际是一部血泪斑斑的迁徙史。其迁徙时间之长，距离之远，范围之大，次数之多，都是历史上所罕见的。在长期的迁徙中，他们顽强地去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在磨难中砥砺出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他们敢于战胜困难，对生活永远充满信心。而每一次的迁徙都是不甘受奴役而退居到压迫者鞭长莫及的地方。他们为争取自由而抗争，为寻求自由而迁徙，从而养成了自由奔放、不愿受约束的个性。

苗、瑶的历史又是一部战争史。他们与炎帝、黄帝逐鹿中原，与尧帝、夏启长期鏖战，他们还与楚国军队、汉朝将士交过手，出过骠兜、精夫等民族英雄。自汉、晋以来，中央王朝动辄发兵数万进剿，尤其是明清以来，战争更加激烈。明朝贵州各族人民反抗接连不断，《贵阳府志》引蓝鼎元《贵州全省总论》曰：“盖自建省以来，终明之世，蛮彝土贼叛者三十有二。中间围省城、陷府州县卫者十有四，杀巡抚藩臬道府州县总兵、参将、指挥、都司、先后有百余员。”其实明代贵州民众的反抗斗争绝对不只 32 起，仅苗族反抗就有几十起，每次斗争往往波及几个州县，交战激烈。如洪武二十五年康佐长官司苗民抗缴赋税，千余人被俘；洪武二十九年清水江苗民反抗官军，500 人被俘；宣德八年乖两、巴香苗民抗议官府，六百余人被杀，一千余妇幼被俘；景泰四年草塘安抚司苗民攻杀官军，近八百苗民战死，一千七百余妇幼被掳；天顺年间东苗十三番攻打都匀城；四千七百余苗人被杀，五千五百余苗妇被掳；弘治年间苗民攻打清平卫和都匀卫，被杀俘万余人，被焚苗寨一百余座；嘉靖年间铜仁、平头二长官司苗民武装起义达 15 年之久，官府动用 10 万大军才镇压下去。清雍正年间，苗民为反抗鄂尔泰的屠杀揭竿而起，在包利、红银领导下攻克多处州县，队伍发展到数万众，势力扩展到方圆千里，政府动用五省兵力共 7 万人，杀戮上万人，焚毁一千二百余村寨才将反抗镇压下去。又如咸同年间，苗族张秀眉等领

导起义历时20年，清廷曾动用15万军队。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苗人炼就出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品性。他们不畏强暴、鄙视懦弱，决不苟且偷生。张秀眉被捕后高声吟唱：“这世我俩去，二世再转来；转来杀官兵，像砍草尖尖。”他们决不惧怕任何强敌，即使在法国殖民者入侵中国时，也敢于用原始的兵器与先进的枪炮对抗，以项从周为首的苗民用血肉之躯守卫着祖国的西南边防，连清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其“兵防如铁桶，苗中之豪杰”。

无数次战争的洗礼，铸造了苗人的剽悍劲猛，他们崇尚力量，喜爱兵器，宋朝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一书说：瑶人善制刀弩弓箭，各地瑶人都“左腰长刀，右负大弩，手持长枪，上下山险若飞”。宋朝朱辅的《溪蛮丛笑》一书说苗人热衷武艺，平时有一种“对刀”的习惯，“甲与乙有隙，两相斗敌，背牌护身，远以标枪，枪尽挺刃而前，名对刀”。他们把兵器视为保护身家性命、抗击来犯者的重要工具。而强健的身体、精湛的武艺则是这一切的基础，所以他们为拥有壮实的体魄而自豪，能用武力打败对手被看作英雄。

在漫长而坎坷的征程中他们靠信念和毅力支撑起民族脊梁，在同伴的鲜血中他们吮吸着勇敢的营养，在悲壮和怒号之后绽放出豪迈与欢笑。风霜雪雨剥落了妩媚铅华，历史的苍凉折射在苗族妇女的服饰中，花团锦簇、绚丽缤纷却“带着一些血和情的成分”。她们把对祖先的思念和对英灵的祭奠浪漫成一幅幅美丽的图案。白褶裙上的三大条花边分别代表“河水黄央央”的黄河、“河水白光光”的长江和“稻花飘香”的大西南。古歌中也这样唱道：“思念无边无际的稻田，把它画在花裙上，画块大田在中间，青山绿水在裙边。”他们的歌声高亢激越，他们的木鼓舞、板凳舞刚劲明快，他们饮酒爽朗耿直。纤弱埋藏在流浪的艰辛里，哀婉则已焚化在战争硝烟之中。

也许是苦难太多太深沉，传说永远流淌着辛酸。流浪跋涉的



足迹可以被风尘掩埋，历史上的惨祸却永远刻记在子孙的心上。唱不完的古歌，挥不去的往事。往事不堪回首却最能引起回首，古歌不堪吟唱却最能引起吟唱。在一代代人不断地回首、不断地吟唱中，历史在记忆中定格。往事越千年，他们却从未忘记，在贵州已繁衍生活了若干代，但在他们的记忆中还不时浮现出祖先蚩尤和发祥地的朦胧印象。但是在千万里流浪之后最终在贵州立稳了脚跟，他们开发了古老贫瘠的贵州，是贵州的早期开发者之一，有理由认为自己是贵州人；他们在贵州用鲜血和生命无数次维护自己主人公的地位和权利，谱写了一首首壮美诗篇，有资格认为自己是贵州人；他们人多势众，不仅在古代是贵州人口的重要一支，而且在今天也是贵州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有声势认为自己是贵州人；他们性格外露，毫不掩饰观点，也不会故作扭捏之态，因此敢于坦承自己是贵州人。

从古代的百越族系中分化出来的布依族、侗族、水族等几乎遍及贵州全省，是贵州南部、西南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同样是外来移民，都有一部迁徙史，至今都流传着有关自己祖先颠沛流离来到贵州艰苦创业的种种传说。在布依族和侗族的古歌中，都说自己是越王的子孙，说“布依”就是“百越”发音的变形，说曾经生活在鱼米之乡。在三都、荔波的水族传说中，说他们的祖先原来居住在广西南宁附近的“邕虽山”，后来被使用铜弓箭的军队驱赶，向北退却，经过今天的河池、南丹，沿着龙江河谷向上迁移，最后在三都、荔波定居下来。还有一首古歌追述他们的祖先漂泊流浪到黔桂边境时有兄弟三人，大哥沿红水河向上而去，三弟顺清水江向下走了，二哥留在龙江上游今三都、荔波一带生息繁衍，成为水族的祖先。这首古歌曲折地反映了布依族、水族和侗族原本是从一个族系发展而来的历史。南北盘江及其汇合后的红水河流域今天主要聚居着布依族，而龙江流域以东的都柳江一带则是今天侗族的主要生活区，布依、侗、水三个民族都属于壮侗语族。所有这些传

说和古歌都从不同层面反映出这些民族的发祥地并不在贵州。

大概在春秋时期,贵州南部就有百越人活动,秦汉以后他们就成为这里的主体民族之一。以百越民族为主体的越国在春秋时期曾雄霸东南,参与大国争战,一度成为中原盟主。公元前333年,楚国灭掉越国,百越俯视天下的时代宣告结束,其命运竟急转直下,不得不四处流散。秦始皇一统天下后,越人居住区大多置于郡县管理之下,经过尉屠睢五十万大军血洗三年,越人遭到灭顶之灾。汉初赵佗割据两广,越人获得短暂安宁。但是统一的趋势不可逆转,武帝“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从北向南四路出击。越人向北冲不破汉军防线,向南飞不过浩瀚的大海,而西南则是今越南的北部,那里已有一个瓯骆国政权,他们惟一的选择只有沿珠江上游向纵深推移。由此,贵州南部迎来了大批逃亡的越人。

从楚军灭亡越国开始,越人便尝到家国沦丧的苦涩,以后又被秦汉统治者把他们从平原驱赶到丘陵海滨,追逼到崇山峻岭,昔日灿烂的文化散落于流浪的征途,被追杀和生离死别更摧毁了已进入文明时代的社会组织。在抗争中人们体验到血缘纽带的力量,氏族部落再次聚合起人群。先进的文明虽在漂泊的生活中散落,险恶的环境却让他们学到了更多的求生本领和更强的适应能力。当他们辗转迁徙到贵州南部的河谷平坝时,仍能保持农耕生活,用简陋的农具与一样从事农耕的濮人共同发展稻作经济,共同创造农耕文化。土著濮人在政权被摧毁之后有一种繁盛不再的失落情怀,远道而来的越人则有一段国破家亡、背井离乡的辛酸往事。土著人既不存在独霸一方排斥他人的专擅心理,外来者也不具备征服对方的豪迈气势,二者错居杂处,彼此接纳,各自的民族特征逐渐淡化,在和平交往中孕育出许多共同拥有的东西,以致于中原人士将他们全都称为“僚人”。

越人从平原水乡迁徙到贵州南部山区后,他们不得不改变居室建筑,他们有的寄居在溪峒,有的“依树为层巢而居”,建起了竹



木结构的“干栏”式房舍。但他们与苗、瑶“不乐平旷”的心态截然不同，总爱把居住地选择在河谷平地，布依族“散在山涧间”，“汲流以饮”；水族“夹龙江而居”，依山傍水；侗族“树平坝近水地居之”。他们仍然以农耕为主要生产形式，布依族是典型的农耕民族，长期种植水稻，水族“种稻似湖湘”。毛南族和侗族也不例外。史书说毛南族“男子计口而耕，妇女度身而织，暇则挟刀操苟柳，以渔猎而业”，《侗族简史》说侗族居住的地区“土壤肥沃，平川及‘洞天’盆地星罗棋布，大者万余亩，小者数百亩”，“稻田养鱼，粮鱼兼营”。

河谷溪畔的居住环境和种稻养鱼的生活方式使贵州南部的百越文化具有浓郁的田园味。他们的歌声悠扬婉转，情歌缠绵甜润，舞蹈轻盈舒缓。他们的村寨三五家为一体，坐落在地势低平的田边水旁，不像苗寨那样往往几十几百家聚集在一起，结构庞大，分布在山腰坡面。他们饱受战乱，因而英勇顽强，对武器十分珍爱，布依族“好带刀剑，未尝舍离”；侗族“边陲有警，众庶云集，争负弩矢前驱，出万死不顾”；水族“善为药箭”，“以射力雄疆”，“出入腰弓矢”。但又不像苗、瑶人那样性情外露，而是“外愚内黠”。

百越各支从广西移居贵州的时候，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影响到乌江以南，是他们与濮人一道开发了贵州南部，因此有理由认为自己是贵州人。他们自进入贵州南部定居一直到明清以前，是这一地区人数最多的民族，即使汉族人大规模迁入后，也未能改变这种状况，因此他们有理由骄傲地宣称自己是贵州人。

最早进入贵州西部的移民是彝族的先民，他们来自云南的氏羌族系。氏羌族系最早生活在今甘陕青川交接地区，战国秦汉时期已有一部分南移到四川、云南，处在“随牧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状态。大约在西汉末年，今贵州的普安、六枝一带已出现不少氏羌人，史书称之为“夷人”。因为贵州的土著濮人势力很强大，所以初来乍到的夷人行事谨慎，双方关系比较融洽。一旦夷人站稳脚跟，而土著濮人又遭中央王朝沉重打击，则出现了另一种景观：氏



羌人的一支在仲牟由子孙的率领下从云南会泽大举东进，将濮人次第征服，使其不得不放弃“耕田有邑聚”的传统生活。仲牟由子孙征服的地区成为东部乌蛮的最重要地区，史称“昆明”，仲牟由在彝文典籍中被尊奉为始祖。相传他有三个妻子，生有六子，子孙不断繁衍发展，形成武、乍、恒、糯、步、默六支，自魏晋以来独霸南中，直至明朝天启初年，因奢崇明反叛于四川，安邦彦兴兵于贵州，被朝廷派大兵镇压下去，其势力才消退。

彝族的先民之所以能够成长壮大成为贵州西部的主体民族之一，有以下几个重要原因：其一是彝族进入贵州的时候正值土著濮人遭受汉王朝打击而处于衰落阶段，前进的道路上阻力较小。其二是进入贵州初期，中原统治者都忙于夺权或保位，无暇顾及边鄙，而贵州远离战火硝烟，为其迁徙、扩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其三，定居以后主动与当地大姓王族联姻，积极参与政治，用权力壮大经济实力，又用经济实力巩固政治地位，尽量避免与当地其他大姓发生冲突。在其他大姓勾心斗角、互相残杀的时候，保全就意味着发展。其四，是审慎处理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准确把握时局，时而归附朝贡，时而拥众自立，时而亲密，时而疏远。在其他大姓因举措失当而招致祸患的时候，成功就意味着壮大。

贵州土著濮人地区原本有较高的文明，但随着夜郎政权的被推翻，濮人创造的夜郎文化很快消失了，因此，较低文明的彝族先民在征服较高文明的濮人地区之后，自己没有较高文明征服。其原因是它对征服的地区采取了恩格斯所指出的第三种形式，即将原来的生活方式原封不动地移植到被征服地区。他们没有接受濮人的农耕生活，没有光大濮人精巧的纺织矿冶技术，依旧“不喜耕稼，多畜牧”，“土多牛羊，无布帛”，保持“马背上的民族”所具有的剽悍尚武，一身草原民族的装束，经常是短褐徒跣，头扎英雄结，身披察尔瓦，“皆衣牛羊皮”。爱养马，喜赛马，善搏斗，崇尚勇猛。《桂海虞衡志》记载他们的打扮是“金环约臂，背长刀，腰弩箭箠，腋

